



我毕生追求的
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

——吴良镛

吴良镛

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944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1950年在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师从著名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主持参与多项重大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研究项目，多项城市设计、建筑设计项目及重大科研课题，由其提出的广义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对建筑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进行了重要的理论探索。

图片来源：CFP

人民得安居 毕生情所系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院士

○ 清华新闻中心记者 程曦 实习记者 于帅帅 赵姝婧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锦绣山河，也有巍峨城郭。中国人世代居住的地方，灾难与建设无数次改变了它的面貌。

这片土地会记住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近70年的时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探索中国建筑与城乡规划的发展道路，为新世纪人居环境建设指明了方向。

岁月和疾病使他的脚步不再像当年那样迅疾、矫健，却挡不住他探索的激情。年届九旬的他依然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为缔造和谐社会与美好人居环境而辛勤工作。

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建筑与城乡规划学家、建筑教育家，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

2012年2月14日，他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

这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这本殷红的奖励证书，承载着祖国和人民对他毕生探索的真挚谢意与崇高敬意。

苦难中迸发的建筑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地战火纷飞，吴良镛的成长历程中饱含着流离失所、国破家亡的民族血泪，这促使他义无反顾走上学习建筑的道路。少小时被典当人威胁要揭走屋瓦，不得不带着伤寒高烧的妹妹告别祖居；日军铁骑逼近南京，加入逃难者队伍的他从此开始颠沛流离；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刚刚结束，轰炸机的阴影就降临合川，死伤无数，毁掉半座城池的大火直到次日还在熊熊燃烧。青年吴良镛背井离乡，目睹国土的沦丧，层层累积的苦难激发了他重建家园的热切愿望。1940年，他走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

1943年，在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暗夜的闪电，照亮了这个建筑学子的心。

1946年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邀，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梁思成夫人林徽因成为系里最初的两名教员。1948年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

深造。在世界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重建家园的创造与困惑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给吴良镛寄去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对祖国重获新生的喜悦之情，希望他赶紧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让吴良镛迅速作出明确的抉择。1950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冲破重重阻挠，绕道归来，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作为新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51年开始主持清华建筑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1952年起，吴良镛历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全面推动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

1959年，吴良镛倡导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此前后，他还曾主持全国建筑会议、制定共同教学计划，参与领导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的建设，并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的编写。他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保定、北戴河、秦皇岛、邯郸等城市的规划建设



吴良镛教授在实地调查中与老乡谈话（1984，四川）

顾问；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图书馆等著名建筑都曾凝聚他的心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余震未消，他就作为最早一批专家参加重建规划。

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次次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越来越深的困惑：20世纪40年代初，他抱着希望避免西方“城市病”的愿望开始学习城市规划，回国后也曾相信中国城市可以完全避免交通拥挤、住宅短缺、破坏自然等现象。然而，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巨，现实面貌却似乎和这一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在曲折中，吴良镛蓄积力量、摸索前进，新的变革契机正在下个路口转弯处等待着他。

时代激流中的探索

1980年，吴良镛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门学

科也开始了新的探求。从西德讲学归来的吴良镛参加了1981年的中科院学部大会，他深深感受到全国学术界探索未来的高昂热情，感受到当代建筑学家对建筑学科发展所应肩负起来的重任。

“这次大会使我认识到，面对新中国成立与‘文革’后的经验与教训，建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走向科学，向建筑学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为了求解这条建筑的科学发展之路，年逾花甲的吴良镛抖擞精神，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同时进发。

在理论上，吴良镛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广义建筑学”的思考，并于1989年出版了专著《广义建筑学》。其着眼点从单纯的“建筑”概念转向“聚居”，“从单纯的房子拓展到人、到社会，从单纯物质构成拓展到社会构成”，大大拓展了建筑学的视野。事实上，广义建筑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广义的住”、“空间环境”、“多学科综合研究”等思想从理论上结合起来，形成了后来人居环境科学思想的雏形。

在积极探索理论的同时，吴良镛还和同事们一起踏遍千山万水，为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贡献重大的开创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在吴良镛指导下完成的“北京奥林匹克建设规划研究”，就是其中较早的一项成果。针对当时已申办成功的亚运会和未来北京奥运会的建设工作，他以“经济时空观”思想为基础，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项目策划、项目运行和赛后安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力图以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建设效果。最终提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以及按需修建比赛场馆、建好的场馆尽量做好赛后使用的衔接安排等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和采纳，该项研究获得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的今天再来看这项研究，我们更能体会到它的前瞻性：奥运会对场馆设施建设的要求相比亚运会时已经有非常大的提升，如果当时就把主场馆盖好了，如今只会成为尴尬的“鸡肋”。拒绝“大而全”，结合实际留下发展空间，这一思想对北京的奥林匹克建设助益良多。

1984年4月底，62岁的吴良镛卸去担任多年的系主任职务。这年夏天，他在清华主楼9层的半间屋子里，带领一名教师和几名研究生，开始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初创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迅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吴良镛的视线。东部这片肥沃丰美的土地已经加速行驶在城市化的快车道上，城市规划的思想、原则却相对落后，发展中出现了种种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于是，他带着助手几下江南，在上海、苏锡常和宁镇扬三个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次又一次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议。

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将重点项目资助投放在建筑领域。在吴良镛主持下，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联袂开展“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这样一个多单位、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的区域性研究，成为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首次尝试。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主要负责苏锡常地区的规划研究。其间，吴良镛对这一区域的发展和每个城市的规划都做了认真考察和科学预测，并指导学生和助手完成了若干城镇和县域规划，使研究呈现出

城、乡并重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这项长达5年的研究于1997年结题，它首次提出区域协调发展观念并注重保留与发扬地方建筑特色，赢得各方好评，获得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进行了项目技术鉴定和结题验收。这位改革开放之初以“小城镇大问题”推动中国小城镇建设的著名学者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为苏南小城镇的物质空间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阔别故土半个世纪，吴良镛终于在生他养他的江南水乡实现了一个久远的梦想。

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和福田中心区规划、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筑环境研究……在这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课题中，吴良镛倾注了自己对吾土吾民的热爱，奉献了自己的才学与思想。他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居环境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一直为世人所铭记。

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奠基人

伴随着理论和实践探索的不断深入，吴良镛逐渐理解到，不能仅囿于一个学科而应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学科发展，因此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这个整合众多学科的“学科群”概念。

1993年8月，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大会的学术报告中，吴良镛（与周干峙、林志群共同撰文）提出“人居环境学”这一新的学术观念和学术系统。

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吴良镛担任科学委员会主席，作大会主旨报告，并起草《北京宪章》。《北京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在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时任国际建协主席斯戈泰斯称赞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建筑评论家保罗·海厄特认为吴良镛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以中、英、法、



吴良镛设计作品



南京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苑(江宁织造府项目)



菊儿胡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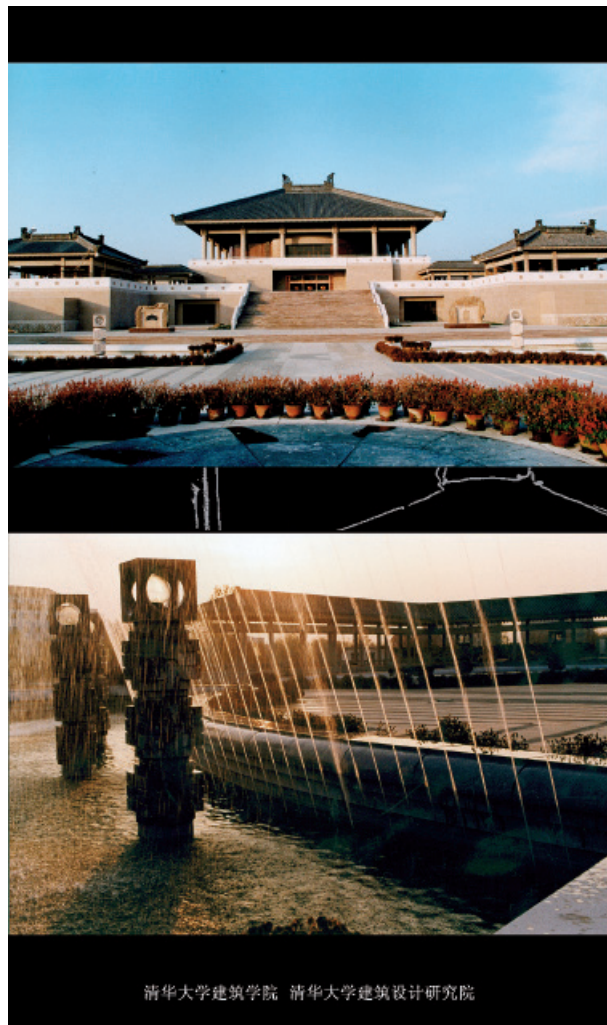
西、俄5种文字出版。

2001年，吴良镛出版专著《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体系、学术框架和方法论，进一步奠定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基础。人居环境科学以人居环境为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聚落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的科学。它针对人居环境需求和有限空间资源之间的矛盾，遵循五项原则：社会、生态、经济、技术、艺术，实现两大目标：有序空间（即空间及其组织的协调秩序），以及宜居环境（即适合生活生产的美好环境）。2010年，人居环境科学作为原创性重大科学技术成就获得“陈嘉庚科学奖”，该奖认为：“人居环境科学理论针对建设实践需求，尊重中国历史传

统与价值，为中国大规模城乡空间建设提供科学指导，……为世界人居环境建设提供指引。”

人居环境科学构建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理论体系，它在建筑学理论上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而如果对吴良镛主持的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进行一番回顾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同样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并以其现实成就印证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重要价值。

例如：自改革开放之初起，吴良镛就一直在思考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展的问题。直到1999年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资助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居环境的基本理论与典型范例”正式立项，其主要课题即为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的发展规划



孔子研究院

建筑创作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孔子研究院

研究。随后，相关研究又先后得到清华大学985研究基金和建设部重点科研项目的支持。

吴良镛以其个人声望和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动员了十多个单位、几百位专家直接参与这一项目，组织了北京、天津、河北等两省一市有关部门和不同专业的合作，利用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起“科学共同体”，在区域层面具体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进行研究。研究确立了地区规划的一些基本思路，如核心城市“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重新集中”的结合、明确划定保护地区或限制发展地区、“交通轴+葡萄串+生态绿地”的发展模式等，无不体现出整体塑造区域人居环境的理念。

2002年研究报告发表后，北京市、天津市先后邀

请课题组参加其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并由吴良镛担任首席领衔专家。这一系列研究直接指导了北京近10年来的建设发展，面向城市蔓延、旧城保护乏力等问题，开创了新时期北京城乡规划的新局面。其中在旧城保护领域，提出旧城积极保护战略，促进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的社会共识，北京旧城整体保护思想逐步达成社会共识。

现在，吴良镛又带领团队开展了面向建国100周年、关于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北京2049”。建设学科群、打造跨学科平台、开展多情景模拟……人居环境科学的思想理念和方法论在其中得到充分体现。



回顾吴良镛的每一次研究，他总是努力走在时代的前面，“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在北京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尚未完全暴露前，就主动开展区域整体的规划研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三峡工程不是一个纯粹的水利工程，而是人居环境一个大的变动，建议应对三峡人居环境建设予以及时关注、切实指导——时至今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已经把“城镇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列为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领域的三个战略重点之一。

我们不妨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吴良镛，没有他所提出的这样一个整合建筑、规划与园林等学科，融贯科技、历史与文化的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为指导，今天中国的城乡发展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正如两院院士、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所言：“吴先生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和中国的实践提出的人居环境科学，从传统建筑学扩展到广义建筑学，再到人居环境科学符合科学发展规律。如今我们的规划设计工作已经相互交叉、融会贯通、相互集成、多学科已经联系起来。实践证明，这样的融贯、集成避免了许多决策的失误，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不可估量。”

矢志不渝的民生情怀

吴良镛做过许多宏观和中观的战略规划，但在1993年，他却因为对北京胡同里一个四合院的改造项目获得了“世界人居奖”与“亚洲建协建筑设计金奖”。

菊儿胡同是吴良镛探索北京旧城保护与发展问题的一块“试验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带领一批又一批研究生在这里进行调研和规划设计。通过居民互助、政府资助、单位补贴等途径，以及房改加危改的方式，当年破败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院落变成由一座座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新四合院住宅。扩展形成的“跨院”又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形成邻里交往的崭新空间。粉墙黛瓦、绿树成荫，气象一新的菊儿胡同仍旧保持了与北京旧城肌理的有机统一。

这个项目规模不大却费尽周折，凝结了吴良镛的智慧和心血。建筑学院左川教授感慨地说：“对这个2760多平方米、仅一万元设计费用的小工程，吴先生可以说是不嫌其小，又不厌其烦。”

选择菊儿胡同，除了旨在为北京旧城建设探索一条道路，也体现了吴良镛一以贯之的民生情怀。菊儿胡同的改建过程中，他特别关心原有居民的回迁情况；改建工程告一段落之后，他还多次派人回访，一直关注着社区活动、绿地保护等工作的落实。

吴良镛曾说：“一个真正的建筑大师，不仅看他是否设计出流传百世的经典建筑，而是看他是否能让自己的国家的老百姓居有定所。”“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

每次外出工作，他总是有意识地到老百姓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在四川成都进行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研究时，他还特地去“圩”（集市）上了解普通农民的生活。在指导清华建筑学院住宅研究方向的发展时，他也特别强调要保持自己清醒的判断和思考，在开展住宅研究时更多关注它的社会属性，对住区和住宅发展的整体状况进行调查分析，为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建言献策。

培养人居环境“集团军”

如果说上世纪中叶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体形环境”思想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建筑平台，那么吴良镛先生创建的人居环境科学则是新时期清华大学建筑学科的办学指导思想。以此为基础，奠定了清华建筑学院面向人居环境的“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学科架构和教学体系。

自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以来，吴良镛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为清华建筑教育的发展倾尽心力。这60多年来，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先后走出建筑领域院士9人（占全国总数的38%），国家勘察设计大师16人（占全国总数的30%），国内外知名建筑学院院长和国际知名学者33人，国有大型设计单位院长、总建筑师、总规划师65人。清华建筑学专业的学科整体水平始终在全

国保持领先。

作为导师，吴良镛亲自培养了81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他广为人知的育人理念。每个学生开题时，他都要针对学生的特点和兴趣仔细琢磨，和学生一起讨论合适的题目。

对于在职的论文博士，吴良镛每年都要召集至少两次以上的学术例会，请来自全国各地的论文博士交流他们的研究进展。在这样的学术例会上，每个人的选题都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打磨修改。

他对学生要求极严，但也充满关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唯佳至今记得20多年前的一个雨夜，吴良镛披着雨衣冲进他在三号楼的宿舍，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和需求的情景。还有一位博士生曾满怀深情地这样写道：“我无法忘记吴先生带着我作的一次古都之行。他这么大的年纪，领着我从北京古城的景山到什刹海，在葱葱绿荫的胡同里穿行，还买了一块特别好吃的烧饼让我品尝。那一刻，我深知他心中巨大的爱，我对这个城市的爱也被他点燃。”

吴良镛提倡让人才在集体“大兵团战斗”中成长。每一个研究和实践项目，都是他培养人才的平台。但是，他特别强调做项目不能像“炸油饼”，盲目进行生产性的重复劳动，而是要在整个集体共同的学术框架下进行，成为从科学进步和创新出发的“作品”。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认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发展极





大拓展了传统建筑学的研究领域，带动了建筑、规划、环境、市政、景观、生态和地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推动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为解决人类当前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空间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在一流大学建设中，如何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为舞台，创新学术思想和理论，吴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建筑学院教授邓卫钦佩地说：“吴先生最大的贡献，一是适应时代需要，勇于理论创新。他在充分吸取前人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大规模、高速度的城镇化的时代背景，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建筑学的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二是面向重大问题，探索实践模式。通过区域、城市、街区、建筑等不同层次的实践探索，他为在中国城乡建设中实现美好人居环境理想找到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方法和道路；三是坚持融会贯通，引领学科发展。他在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搭建起人居环境科学这个共同的平台，使建筑学领域内各学科的协同创新成为可能。从这一点来说，他是独一无二的。”

“少有的刻苦、激情和坚强”

1948年在吴良镛赴美留学前夕，林徽因读到梁思成写好的推荐信后，又提笔增添，“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

这的确是对吴良镛奋斗精神的一个传神写照。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总是在清晨最静谧的时刻起身，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工作，白天再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

曾担任吴良镛科学秘书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回忆说，起草《北京宪章》时，经常在凌晨2点多，他把按吴良镛批注修改好的材料骑车送到吴家门前的小报筒，4点多钟吴先生就会起来工作，开门取走材料进行再修改，精益求精。

2008年夏天，吴良镛不顾南京炎热的气候，坚持在金陵红楼梦博物馆的工地上现场指导，结果由于天气炎热、出汗过多而突发脑梗，先在天坛医院抢救，再住进康复医院治疗。

在天坛医院，面对前来探望的学院教师，他的第一句话不是谈论病情，而是吃力却坚定地说：

“奥运会马上就要召开了，在奥运期间调查首都北京的城市空间状况是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不要耽误，一定按照之前布置好的做下去，把调查做好。”听到这句话，在场的教师既意外又感动：先生全身心为事业投入的精神，是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那段时间，病床就是他的办公桌。虽然身体不能动，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手头所有工作的关心：通过口授安排南京工地的工作，思考《中国人居史》的研究，听取研究生课题进展的汇报……

时年86岁高龄的吴良镛，还以惊人的毅力进行身体康复训练。酷热的夏天，他穿着小背心，每次做完康复训练，衣服全湿透了。在医院里，他还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右手的功能也通过按摩和训练一点点得到恢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出院时他送给医护人员的答谢礼竟是一幅漂亮的书法。对于一个刚刚从中风状态恢复过来的耄耋老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为吴良镛（左）、谢家麟颁奖



吴良镛在指导学生

这是多么的不易！建筑学院边兰春教授深有感触地说：“只有在那个过程中亲眼见证他每一点变化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吴先生的毅力之强大。看到这些，也就为他在事业上的坚持找到了一个注脚。”

现在，吴良镛又重新投入到高密度的工作中。同事们给他制定了保护身体的“八项注意”，他一般总是尽一切可能身体力行，有时也不免“巧妙迂回”。

活到老，学到老。学养深厚令人叹服的吴良镛，至今依然敞开胸怀吸纳一切有益的思想，孜孜不倦地探索新知。最近热销的《乔布斯传》，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视野。吴良镛认为乔布斯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这使他很感兴趣，想看看是否能从中获得借鉴，对学问有所裨益。

吴良镛为全校研究生开设《人居环境科学导论》课程，多年来他坚持亲自做开课和结课演讲，只有2008年生病时缺席了一次开课，到年底，他还是拄着拐杖从康复医院走上了讲台。

2011年12月27日，是最近一次结课演讲的时间。面对台下那群满怀热切目光的年轻人，他回顾了自己从对建筑学产生困惑到完成几次“顿悟”、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的全过程，谈到了对这门学问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融汇发展的期待，也回忆起抗战时在茶马古道上感受到的风土人情和人民疾苦，以及由此对那里的建筑、那里的百姓所抱有的特殊情感……这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

在这次演讲中，吴良镛恳切地评价了自己所创立的人居环境科学：“人居环境科学提出后，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和研究的构建，并且已经进行了融贯区域、城市、建筑等多种层次的实践，但仍旧要不断地完善、展拓。它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到现在并没有定型……我们不过点燃了一根小小的蜡烛，热情地期待后继者发扬光大，使之普照大地。”

手擎这支明烛，90岁的吴良镛依然孜孜不倦，行走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

（转载自《新清华》2012年2月17日）